

· 孟繁华文集 ·

1978：激情岁月

M E N G F A N H U A W E N J I

非外借

孟繁华



人民文学出版社

· 孟繁华文集 ·

1978：激情岁月

M E N G F A N H U A W E N J I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978:激情岁月/孟繁华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孟繁华文集)

ISBN 978-7-02-012463-3

I. ①1… II. ①孟…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评论—文集
IV. ①I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38772 号

责任编辑 付如初

装帧设计 李思安

责任印制 王景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玺诚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60 千字

开 本 890 毫米×1290 毫米 1/32

印 张 6.875 插页 3

版 次 2018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2463-3

定 价 3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自序

1978年初中毕业十年后,我考取了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东北师大历史系非常著名,尤其是世界上古史研究,享誉海内外。入学后,给我们78级上课的,恰恰是世界上古史的权威专家林志纯先生。林先生是福建人,一口浓重口音的福州普通话。出生于1910年的林先生,1978年已经68岁了。他个头不高,但非常挺拔。上课时他没有讲义没有教案,手里举着一支粉笔便走向讲台。林先生讲的是亚述学。作为一个初中都没有毕业的学生,听一个顶级专家用福建普通话讲从未听说过的学问,其情形可想而知。

我觉得自己难以完成学业,于是便有了强烈的转到中文系学习的想法。那时的大学不允许随便转系,我也经历了非常曲折的转系过程。最终还是如愿转到了中文系。我这样叙述从历史系转到中文系的过程,说到底还不是遇到林先生而“知难而退”——78级历史系的同学除了我都学得很好,而且有许多人在历史学领域取得了杰出成就。现在想来也真是对不起林老先生了。

说到底,转系还是个人兴趣使然。一个初中生大概也只能对文学感兴趣——因为可供选择的兴趣实在太有限了。那时东北师大的中文系也是名系。著名学者杨公骥、蒋锡金、孙晓野、何善周、孙中田等都在那里任教。1982年从东北师大中文系毕业后,我分配到了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中文系任教,从那时起就成了当代文学的专业教师。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和普通院校差别很大,教师基本是组织教学,聘请国内各学科造诣较高的学者做主讲教师,本校教师做的应该是

教辅一类的工作。但这个工作有很大的好处，就是可以直接接触本学科最好的老师。谢冕教授、洪子诚教授、刘锡庆教授等，就是我在电大组织课程时开始接触的。在组织“当代作家谈创作”课程时，也就是1983—1984年期间，我也有机会先后见到了晓雪、流沙河、周克芹、刘宾雁、刘绍棠、李国文、张弦、李准、叶文玲、汤吉夫、路遥、雷抒雁、张抗抗等著名作家，这些当然使我对当代文学有了另外一种有趣和更加直观的感受。

1989年，我到北京大学做访问学者两年，然后考取了北京大学中文系谢冕先生的博士研究生。谢先生以“批评家周末”的沙龙形式教学，既是上课也是讨论。洪子诚老师以及陈晓明、王宁、韩毓海、旷新年等学者，都参加过这个沙龙。这个沙龙坚持了十年，在圈子里有很大的影响。谢先生被称为北大民主的象征，科学的象征是严家炎先生。谢先生民主、宽容，但做起事来极为认真。他除了组织学生上课讨论之外，还先后组织出版了大型丛书或书系多种，有的大型书系我以“跑龙套”的身份参与了部分组织工作。这些经历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到北大学习，使我对包括当代文学在内的学术工作有了完全不同的认识。客观地说，我的学术生涯是从进入北大开始的，或者说，是老师谢冕先生改变了我的人生。

北大博士研究生毕业，我分配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研究室工作。后来到当代文学研究室工作并担任了研究室主任、博士研究生导师。社科院文学所是国家最高文学研究机构，研究条件、学术气氛和研究水准在国内都堪称一流。我的主要学术著作和文章，大都是在文学所完成的。至今我仍然非常怀念那个时代的文学研究所。

张炯、樊骏、杜书瀛、陈骏涛、董乃斌、赵园等学术前辈，既是各研究领域著名的学者，同时也是从事学术工作的榜样；汪晖、陈晓明、蒋寅、许明、吕微、李洁非、陈福民、靳大成、彭亚非等同事风华正茂，他们的学术热情和学术抱负，都曾深刻地影响着我。

后来，我受聘于沈阳师范大学，任特聘教授、中国文化与文学研

究所所长,工作至今。沈阳师范大学不是名校,但它是一所充满朝气、给人以希望和鼓舞的大学。学校给我的学术空间和特别支持,我深怀感激。

当代文学研究,一直是一个备受议论的学科,甚至是一个只可意会的、受到“歧视”的学科。任何人都可以对当代文学说三道四,只因为它“没有学问”。但是,事情远非如此。是否“有学问”不在于研究对象,而在于对研究对象的见识和见解。不是说研究与历史有关的、越是古老的学科就越有学问,研究当下的就没有学问。事实上,研究与历史有关的学科,也一定要与当下建立联系。这就是克罗齐说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当代的理论、问题、知识等,都潜移默化地融进了对历史的阐释和处理之中;同样的道理,如果没有“上游”学科的知识、没有西方的理论和创作知识,想做好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和批评,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不屑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和批评的人,显然有偏见,是一种对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缺乏了解的表现。我这样说,并不是强调研究当代文学比研究其他学科更重要,而是说,客观地看待一个学科和它的研究者,可以使我们少犯或者不犯常识性的无聊错误。

我从事当代文学研究和批评三十多年,陆续发表了几百万字的文字。文集是从这些文字中编选出来的。我知道,纸质媒体虽然是全媒体的一部分,但它的弱势地位和边缘化趋势已无可避免。纸质媒体加上文学批评这个行当,二者合在一起,其命运不难想象。当然我也知道,学术活动在任何时代都不可能大红大紫,那也不是学者工作的目标。我们不必神圣化文学批评的重要性,同时也不必妄自菲薄。世事沉浮万物消长,在一切未果的时候,我们不妨将眼光稍稍放远一点,历史自会显示出事物应有的价值。

以上是我从事当代文学研究、教学和批评工作的简单履历,无甚新意。

非常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能够接受出版这套文集。尤其感谢责任编辑付如初博士,她的认真负责让我非常感动。她的工作避免了

文集中的一些问题。感谢我的父母、家人,感谢我的老师、学生和朋友们。正是因为他们,红尘滚滚的人间才如此可爱,枯燥的学术活动才值得用一生去追求和从事。

2016年9月22日于北京寓所

目 录

绪言 百年文学中的 1978	1
一、黎明前的广场仪式	16
1. 广场文化	16
2. 政治觉醒的仪式	20
二、北京的“翻身道情”	24
1. 重返广场	24
2. 重返历史	27
3. 启蒙之音	30
三、人道主义的话语实践	34
1. 大众化的“伤痕文学”	36
2. 一代人的反省	41
3. 情感危机	49
4. 人道主义话语实践的双重性	54
四、归来者的自述	59
1. “归来的歌”	60
2. 重新进入社会	63
3. “重放的鲜花”	69
五、知青一代的乡村之恋	79
1. 知青“悲壮的青春史”	81
2. 重返乡村乌托邦	89
六、文化英雄	96
1. 政治批判与“揭秘”策略	97

绪言 百年文学中的 1978

1970年代在20世纪后四分之一的历史叙事中,是一个被人们反复谈论的年代,它的重要性,首先是作为开启又一时代的标示,它有了伟大的象征意义并深植于一个民族心灵深处。谈论起它就意味着体验共同的解放、拥抱共同的复活节,它仿佛传达了这个民族共同的情感与幻想,共同的精神向往与内心需求,它是人们激情奔涌的新的源头,往日的心灵创痛因它的涤荡抚慰而休止并且康复,因此,这也是又一个“结束或开始”的年代、又一段“激情岁月”。

文学作为这一时代的表意形式,最为有效和准确地表达了这一时段民族的精神形态和主流意识形态意图。它以传统的英雄情怀和启蒙话语参与了动员民众、决裂旧的意识形态和共同创造未来、走向彼岸的意志。在这一层面上,文学的作用和意义是不能取代和低估的,就如20世纪以来各个重要的历史关头一样,文学东方化的角色依然没有放弃。因此,“结束或开始”对于1970年代的文学来说,可能更是意味深长的。许多年以来,人们对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争论不休,在文学远离现实或超凡脱俗、有意宁静致远的时候,人们会指责文学缺乏使命与忧患,指责文学家对生活缺乏热情地漠然置之;而当文学紧随时代脚步,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时候,人们又对雍容雅致、仪态万方的文学感慨系之叹为观止。因此,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文学实在是一个难以言说的问题。历史处境的差别必然会使人们产生不同的精神需要,进而会要求价值不同的文学。另一方面,文学不同的表现形态并不取决于人们一厢情愿的要求,它的生产起码来自两方面的规约,一方面是意识形态的意图,一方面是作家的内心需求,两

者都会构成文学生产的支配力量。前者作为公共话语可以成为文学生产的守护力量,它使作为意识形态表意形式的文学获得合法性;后者则更多地源于民族的精神传统,它浸润了作为知识分子的作家的心灵,成为一种自我暗示性的文化指令。前者更多地契合了社会、时代精神的需要,更多地着眼于策略性、临时性和功利性目标;后者则更多地期待文学自身,更多地关注人类基本的价值目标,对理性、正义、善和爱、忠诚与友谊倾注热情。当然,二者并非截然对立的,事实上,许多优秀的作品既可能表达了对当下生存处境的关怀,同时又实现了对人类基本价值目标维护的承诺。

而于1970年代的文学来说,它奇异地统一了上述两个方面的规约,或者换句话说,它既表达了意识形态的意图,同时也满足了作家的内心需要。就意识形态来说,动员民众参与实现现代化的期待,并借此完成社会发展形态的转型,在新的目标设定中使民族心理重新获得自振并建立自身的权威性和社会信任感,是它重要的时段性任务;就作家的内心需要来说,挣脱长久以来的“一体化”的精神统治,争取精神自由,表达他们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参与欲望,并以此体现知识分子的英雄情怀,使他们大有恰逢其时之感,他们的倾诉欲望终于有了机会得以满足。那时,由于历史观念的惯性作用,虽然仍有顽强的阻力形式出现,但就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来说,它们所扮演的角色更像是负隅顽抗的一出闹剧。因此,1970年代的文学在20世纪下半叶首次以英雄的姿态通过了凯旋门,这在百年中国文学史中则是少见的景观。其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文学所表达的情感和愿望不仅仅只属于作家们,同时它也来自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和守护。

20世纪中国独特的历史处境,使中华大地布满了沉重和苦难,伴随它的文学便少有欢愉和雍容,更多的则是它的悲声与战叫,而受挫后的“闲适”或响遏行云的礼赞多被认为是变形的扭曲,文学的批判力量常常由于压制而难以尽其职守,文学的表达便不可能都是由衷之言,它的策略性考虑或自我保护的本能意识逐渐幻化为普遍性,甚至成为一种培育和侵蚀力量为后来者所接受,从而成为文学家们

的自觉追求,这也是 20 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文学多有“作假”之嫌的重要原因。1970 年代的文学则大不相同,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批判的倾向是这一时代文学的主潮,就当代中国文学来说,以沉重的倾诉和愤懑的发泄作为叙事的主能指,这还是第一次。因此,1970 年代的文学也是重新改变文学形象的一次悲壮的努力。社会从来没有像这一时代那样对文学情有独钟,作家成了这一时代的民族英雄,他们所拥有的礼遇和尊重几乎是空前绝后的,这也极大地满足了作家内心期待的悲壮感和使命感。同时,它也为日后文学的失落埋下了伏笔。

应该指出的是,那一时代文学的影响力并非全然来自于文学自身,或者说,社会对文学的期待亦非是对精致与深长的讲求,普遍的心态是将文学作为宣泄的渠道、代言的工具,只要能够表达人们未曾道明的委屈饮恨、难以言说的莫名压抑,对文学的粗糙形态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因此也可以说,1970 年代的文学依然是政治文化的一部分。人们将解放的期待和欢快诉诸文学是大可理解的;现代化的承诺刚刚启动,物质世界的丰富还仅限于想象,在清贫平淡的生活中习惯了的人们,对实利的追求尚未觉醒,但长久的意识形态化的生活却培养了整个民族关怀政治的风尚,这一点酷似大革命时代的法兰西民族,人们可以忍受并不富足的物质生活,却无法忍受对政治参与的剥夺。物质世界的改变是需要时间和基础的,而文学的改变只需观念的改变即可部分地实现。被压抑已久的知识界在时机到来时,迅即被点燃,文学以超前的姿态赢得了社会信赖,它的政治性前提便是第一位的。尽管如此,对 1970 年代文学的肯定立场仍是我们不能放弃的。它的种种弊端我们将作出分析和述及,并论证出其背后隐含的文化原因。但它毕竟开启了一个不可改写的新时代,其后文学的发展和成就都有赖于 1970 年代的努力,甚至它以牺牲文学性作为代价,都将作为重要的文化遗产而备受珍视,独特的处境使我们有理由考虑,自由的文学不能在缺失自由的环境中意外地发生发展。

这一时代文学生产的主体主要是两代作家,一代是 50 年代成长

起来的中年作家,一代是成长于“文革”期间的知青作家。他们的阅历和观念作为两代人来说有很大的不同,但又是最为相近的两代人,他们都共同受到新中国理想主义的哺育,共同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同时都有被流放的共同经历。有区别的是,50年代那代人基本完成了受业过程,无论是知识性的还是观念性的,他们是国家规范化的精神流水线统一造就的产物。因此,观念蜕变于这代人来说相对困难些,在他们的作品中,无论以怎样激进的姿态出现都不能淹没他们昔日接受的文化信念,对信仰的忠诚、对50年代理想主义的恪守、对未来充满信心的浪漫主义期待等等,往往以自我欣赏甚至自恋的方式予以表达;知青一代则提前了文化“断乳”,他们没有受到完整的国家规范化教育,他们观念的形成一是源于“文化大革命”狂热而盲目的冲动,一是源于“文革”后知青生涯的幻灭困顿。巨大的反差使这代人大多处于精神漂泊状态,与50年代一代比较起来,他们更多的是怀疑、愤懑,寻找精神之根是他们在这一年代主要的思想活动。

这两代人作为1970年代文学生产的主体,他们的阅历和文化背景便大体决定了这一年代文学的品格。这是一个激情奔涌的时代,一个充满了青春气息和浪漫想象的时代,它具有传统与现代的双重意味,它又极大地影响或导引了时代的走向。毫不夸张地说,1970年代是迄今为止我们民族新的精神故乡和文化资源,它培育的新的精神既同世纪之梦密切相关,承传了百年来优秀分子对历史挑战的回应,同时它又注入了新的文化血脉,即应运而生的精英文化。

精英文化的核心话语是现代性问题,它绵绵不绝地延续了百年。出于抵抗西方和赶上西方的内驱力,近代洋务运动在物质技术层面的变革,到康、梁政治制度改良的幻想,再到孙中山争取社会制度变革的努力,从文化层面来看,其中都明确地带有现代国家的追求意识。随着西方文化的不断涌入,有识之士意识到仅靠富国强兵、立宪运动或推翻旧的王朝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更重要的是民族自身的变革,这一变革的要义是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梁启超早年曾

自称为“中国之新民”，他办的杂志也叫“新民丛报”，这一“新民”的思想甚至影响到青年毛泽东，“新民学会”就是以毛为核心的。陈独秀也曾谈道：“吾人首当一新其心血，以新人格、以新国家、以新社会、以新家庭、以新民族。必迨民族更新，吾人之愿始偿。”^①这一追求中有明确的民族意识；五四时期周作人又提出了“人的文学”，把民族的更新具体化到“人的意识”。^②

从“国家意识”到“民族意识”再到“人的意识”，是现代性追求的具体表达。虽然自20年代起“阶级意识”以压倒一切的气势统治20世纪思想文化领域长达60年之久，但“阶级意识”里仍然具有明确的现代性关怀，把劳动人民和无产阶级从被剥削和被压迫中解放出来，建设一个民主繁荣昌盛的现代国家，打翻一个阶级，解放一个阶级，本身就蕴含着现代性的巨大诱惑力和目的论色彩。这也正是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人们接受、信奉这一理论的原因。只不过在疾风暴雨式的动荡和斗争中，这一意识的巨大缺陷被掩盖和忽视了。因此当七八十年代之交中国的又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到来之际，知识界和主流意识形态对“阶级斗争”学说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和反省。^③关注的焦点重新又回到“国家意识”“民族意识”和“人的意识”上来。

现代性作为核心叙事话语，同时便意味着它具有了普遍的意义。一方面，它成了凝聚民族向心力的共同关怀，可以以此来呼唤民众，可以建立起健康自信的主体意识；另一方面，对知识分子来说，可以找到一个生存的支点，一个可以依托的精神资源。马克斯·韦伯曾指出：“知识分子以各种方式寻找一种能扩展到无限的决疑术，以便赋予他们的生活一种普遍的意义，从而找出与其自我、人类和宇宙的统一性。正是知识分子把世界观转变成意义问题。”百年来，知识分子生存于现代性这个“普遍意义”之中，在这里他们找到了精神宿地，不再有那种“边缘人”和“流浪者”漂泊无为的惶惑。然而，这一关怀与主流话语合流之后，知识分子又因此付出了牺牲这一阶层属性的巨大代价。

在五四那代人身上,他们的现代性关怀与个人的精神独立存有深刻的矛盾,一方面,他们深怀启蒙的热望,同时又对昏睡中的华夏子民深怀绝望;另一方面,他们有强烈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同时又不断有精神独立的自我暗示。作为启蒙的基本任务,是使全体国民从狭隘愚昧的小农文明中解放出来,成为具有现代文明品格的人。陈独秀当年在《敬告青年》中就提出,人应当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隐退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人。这些提法表明了启蒙思想家理想的现代文明同小农文明的根本区别。但是,“和维护传统的小农文明的农民运动、农民战争相遭遇时,启蒙运动自然就会发现,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与殖民掠夺、反对封建主义的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方面,他们确实是同一战壕的亲密战友;在变小生产为大生产、变自然经济为商品经济、变小农文明为现代文明方面,他们的价值取向与行动实践又大相径庭。启蒙运动所希望改变的,却往往正是农民运动所坚持的;启蒙运动所希望达到的,却往往正是农民运动所希望去除的。启蒙运动与农民运动之间这种既联盟又对峙的复杂关系,便引发了他们两者之间既相颀颀又相渗透的特种对流运动”^④。这一问题显然是知识分子无力解决的,即便他们认识到了也束手无策,最具韧性的鲁迅先生也只能作绝望的抗争。

还有,动荡的社会环境以及血与火的残酷斗争,知识分子在五四时期形成的特立独行的风采和个性不可能形成传统并且延续。各种的政治斗争此起彼伏,从未间断,它可以把最为平和的知识分子也卷进它的中心,他们无法成为书斋的看客或局外人。国家和民族的意识促使他们必须投入到斗争中去,他们不能维系内心的平静。国家、民族这样的群体概念自然还会引起他们由衷的冲动。“革命文学”提出之后,反对个人主义而以群体至上的观念日甚一日地占据了统治地位,并得到日后几十年知识分子普遍的认同。20年代末,蒋光慈提出:“革命文学应当是反对个人主义的文学,它的主人翁应当是群众,而不是个人,它的倾向应当是集体主义而不是个人主义。”^⑤既

然文学应当是群众的,是集体的,那么一个迫切的问题就是文学语言的“转译”问题。因此,“由谁提出民族文化的语言?这个问题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在30年代的民族危机中间已经很迫切;他们对‘古老的’精英文化和20年代的西方主义都抱怀疑态度,他们带着现代性在中国的历史经验中寻求一种新的文化源泉;这种文化将是中国的,因为它植根于中国的经验;但同时又是当代的,因为这一经验不可避免是现代的。不少人认为‘人民’的文化,特别是乡村人民的文化,为创造一种本土的现代文化提供了最佳希望”^⑥。德利克教授的研究是相当值得重视的。随着民族矛盾的激化和服从于民族斗争的整体需要,一套新的文学话语被创造出来并日益完善。首先是对民间生活比较熟悉的作家创作出了具有浓重民间生活气息的作品,它的代表人物是赵树理。然后这套话语便占据了文学史的主导地位。但是,也正是自这一时代起,知识分子与大众的地位颠倒过来了,作为“开启民智”的知识分子开始成为大众的学生,他们从行为方式到思想情感都必须努力向大众倾斜,知识分子走向民间蔚然成风。开始它是被诱导的,但逐渐变为知识分子心悦诚服的指导性思想。以这样的观念和情感对待文学,就必然要站在劳动大众的立场上去阐发“大众”的看法和感情,而不可能再是作为知识分子的独自感受了。文学语言的“转译”问题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完成的。一切个人的或知识分子的情感、思想、趣味、选择,都必须“转译”为“人民大众”的、“民族”的、国家的。文学的表达形式也必须是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因此,文学的“现代性”意指,在“转译”的过程中,始料不及地首先改造了最初对它关怀的群体。文学的功利性关怀也日甚一日地影响和改变了作家的心理结构。

“现代性”意指作为历史精神的一部分对作家心态具有极大的制约性,在特定的时期内它甚至是无可抗拒的。但作为知识分子的作家的心态毕竟不同于职业革命家具有明确的目标,作家阶层属性的规定性决定了他们心态的多重性质。他们常常为历史精神所感染,自觉地投身于历史精神的驱动之中,但他们的个性品格又时时表

现出特立独行的一面,这又往往遭到历史精神“权威”阐释者的不满乃至惩罚,因此即便作家怀有真诚善良的愿望,仍不免被残酷的斗争淘汰出局。自从知识分子与大众的位置发生了转换之后,知识分子惨遭淘汰和清洗的事件已不再令人感到震惊,它的屡屡出现已使人们司空见惯。从鲁迅遭到围攻之后,王实味、萧军、丁玲、罗烽、艾青在延安遭到了严厉而颇有“高度”的批判,新中国成立后从思想改造运动开始,批《武训传》、批俞平伯、批胡适、批梁漱溟、批胡风、反右斗争、批“中间人物论”、批“三家村”一直到所有的作家全军覆没的“文化大革命”,知识分子似乎与“历史精神”已经无缘,他们彻底地成了历史的“边缘人”。这一悲惨而残酷的历史境遇,极大地改变了作家们的心态。“三十年代以后的中国历史,就是一部不断逼迫知识分子舍弃理性的自尊和自持的历史,一部不断逼迫他们向求生本能屈服的历史。从消极退让到主动迎合,从自我压抑到自我毁灭,知识分子面对社会的精神姿态越来越低,由后退而下跪,又由跪倒而趴下——在‘文革’的最初几年间,知识分子在精神上成片成片地自动趴下”^⑦的悲惨情景,便可以想见他们在精神上曾受到了怎样的伤害以及心态发生了怎样的畸变。面对如此的现实,知识分子可以选择的道路无非是“逃避和依附”^⑧这两条路。这外部环境自然是有目共睹不可忽略不计的。无论是出于作家的良知还是出于对权威话语的压力,作家都将自觉或不自觉地追随主流意识形态对历史精神的阐释,于是这就形成了百年来占主导地位的“主流文学”,在“主流文学”中我们都可以不费思索地认定它产生的特定年代以及发生的历史事件,因此说百年来的中国文学是百年历史的缩影乃至副本也并不是没有根据的。

但是,如果把作家心态的全部复杂性完全简单地归结于历史精神的制约或作家“进”与“退”的选择,则只涉及了问题的一半。另一方面也许是更为重要的,则是来自作家自身的原因。

尽管百年来的知识分子尤其是作家遭遇了太多的不幸,但忧患情怀的传承仍促使他们情不自禁地以文学作为手段或方式积极地介

入社会,夸大文学改造社会和灵魂的作用,自觉地认为自己肩负着社会的重大使命。在“‘文革’后文学”中,不仅像王蒙这样深怀“少布”情结的作家“热切地呼唤那些忧国忧民、利国利民的作品,那些勇敢地直面人生、直面社会矛盾而又执着地追求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的作品,我们欢迎的是那些与千千万万的人民命运休戚相关、血肉相连、肝胆相照的作品。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将不仅看到文学的精致和美妙,作家的技巧和才华,而且看到一颗颗跳动着的、鲜红的与火热的心”^⑨。像蒋子龙这样的“公民文学”^⑩作家要求自己“对生活和命运负责,严肃地、勇敢地阐明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和困难”^⑪,使自己“向人们表达思想和感情”“有助于人们的斗争和成长”^⑫。就像张承志这样年轻的作家,也虔诚地认为,在自己的意识中,从未把自己算作蒙古民族之外的一员,更没有丝毫怀疑过自己对这种牧民的爱与责任感,并且也坚信他们总在遥远的北国望着自己并期待着自己实践对他们没有说过的诺言。这虽然是建立在一种想象中的关系,但这种想象却使作家变得异常庄严而沉重,因为他已经负有了责任与使命。张承志是首都红卫兵那代人,“火红的岁月”赋予他以理想的方式思考生活与文学尚有可以理解的理由,但生于陕西乡村的富有中国传统文人特征的青年贾平凹也同样认为“写书于我,是作用于社会,作用于时代”^⑬,几乎就是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了》中的使命思想在80年代的延续。

不仅男性作家如此,女性作家也同样肩负起了重担。初入文坛时写过《从森林里来的孩子》的张洁、写过《一个平静的夜晚》《留在我的记忆中》的张辛欣、写过《哦,香雪》的铁凝,都逐渐地放弃了她们女性特有的细致、温情、平和的特点而走进了富于男性化的激烈与沉重。张洁后来的《沉重的翅膀》等、张辛欣后来的《在同一地平线上》等、铁凝后来的《麦秸垛》等,都负载着鲜明而强烈的社会内容。这一心态的转换也许张抗抗说得更为清楚:“十年内乱中对人性的摧残,对人的尊严的践踏,对人个性的禁锢、思想的束缚,1978年以来新时期人的精神解放、价值观念的重新确立……这些关系到我们